

The Literary Criticism Close to Us

身边的

文学批评

温远辉◎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身边的 文学批评

温远辉◎著

海风出版社
HAI 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边的文学批评/温远辉 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80597-703-4

I. 身… II. 温…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1109 号

书 名: 身边的文学批评

作 者: 温远辉

责任编辑: 刘 克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 350001)

出 版 人: 焦红辉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11.75 印张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7-703-4/I·146

定 价: 18.00 元

身边的·广东的·中国的

——序《身边的文学批评》

金 岱

远辉是个忙人。

一是忙工作。远辉是个诗人，可也是个能做实事的人，事事总做得扎实（这可是一种难得的人格张力）。我总见他陀螺一般地对付着工作上的各种事情，难得见他闲（只有喝醉了的时候，我有时开玩笑对他说）。

二是忙朋友。远辉人好，喜交友。天南地北，上下四方，有朋一起把盏，不亦悦乎；有朋一起畅叙，不亦悦乎！

所以，当他把这个批评文集的一厚叠稿子递给我，说要我写个序时，我着实还有点吃惊。因为我知道，他有个诗评集子已快出来，另外还有个诗论大著也到了已烘好要出炉的时候了。

当然，说吃惊，也是个玩笑话。远辉从来如此，我可是知道得太清楚了。我们朋友间说，要约远辉的一个稿子，非把他裤子脱了藏起来，让他出不得家门，否则拿不到。但到他真要是拿起了笔来，那就是哗啦啦清泉喷涌，就是个才华横溢嘛。（他的文字也总似清泉，写什么都看得出那诗人的本质，这和他平日里在朋友间的那股豪侠味也构成了一种张力。）

说吃惊，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这不是个诗评集。远辉是个诗人，更主要的，是个诗评家。而这个集子里的所评，则举凡小

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理论批评、选编的文集，总之是除诗之外的任何文体文类，无所不包。

因此到底还是不能不有点吃惊。你看他忙工作，忙朋友，忙他的主打——诗的论评，居然还忙出了个如此这般无所不评的集子来。

然而，当我拿起这个转借庄子的话来说是“影外微荫”（我的意思是边缘的边缘）的集子来往下细读时，心里却生出许多的感慨来。

这个集子所评的文体虽然多样，而所评的作家作品，却极是有讲究的。这个讲究，确实就是书名所道出的“身边”二字。尤其是身边的不知名的，年轻的作家作品。集子中所评，也有一些是名家名作，但主要的，占大多数的，是还不怎么知名的，可能还相当年轻的作者。

美学里讲“距离产生美”；俗话说，“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身边的学问难做”。总之，人心大体如此，有距离才肯欣赏，有距离才牵得住眼球。身边的，切近的，常常是最被忽视，甚至漠视的。我做了几十年的老师，对这一点很有了解。学生对于老师总是尊重的，然同时对老师的所言，所写，所思，其实往往又是忽视甚至漠视的，因为老师总是身边的。学生对老师如此，更何况读者和批评家对作家作品呢。

尤其在广东，这一点让人感觉特别强烈。我来广东近二十年，广东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学者，文人，他们眼里是绝没有广东的。广东无文学，广东无批评，广东无思想，广东无理论，凡此诸般，他们都是要嗤之以鼻的。

（例如文学，那毕竟就是陕西的好。他们说。）

可对于远辉来说，他的身边就是广东。

他做了多年的《作品》杂志的编辑和副主编，现在又做着省作协的副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他的身边当然就是广东的作家们了。

然广东的作家，广东的文学，就真的没有关心关注和批评的价值吗？

据报载，官方统计，广东常住人口今为 1.2 亿。

这个数字肯定是打了折的，我们稍放宽一点，再加上流动人口，广东今天的人口，少说也有2亿之多。

这个人口超过日本（1.27亿）。比欧洲所有大国人口都要多（俄国1.4亿；德国8千万；法国6.3千万；英国6千万）。就是美国，也不过三亿人而已。

这样一个人口的文学是可以嗤之以鼻的吗？

现代心理学、精神医学和医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表明，人的心理，不仅受到宏观的社会文化，非常重要的人还受到地域性，地方性社会文化的影响。

这样一个人口这样一个地域的社会文化是可以嗤之以鼻的吗？

更为重要的是，关注广东，直至今天仍然可以说，就是关注中国，从广东的视角关注中国，关注世界。

因为直至今天，广东仍然是改革开放的文化前沿（经济的位置正在形成三驾马车持平的局面）。一百多年来，广东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前沿。这正如西安早不再是都城，却象征地仍是传统的文化前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陕西的文学好，那是因着传统文化热，而许多的知识分子们又喜欢趋这个热的原因）。

90年代以来，广东一直在被人们称作文化沙漠。与此相应的是，传统文化热不断升温。批“五四”，倡读经，直至今天有人喊出：人类中唯有儒家有开万世之太平的文化基因，因此，儒教中国，儒教世界，势在必行。

现代化本然地包含着严重的负面和病症，传统文化的矿藏中当然含有宝贵的精华，二者绝然划分，一味扬此抑彼，自然不对。然而，一味扬彼抑此，扬传统，抑现代，在中国的现代化正在向着成熟之路艰难迈进的今天，是一个可以称道的文化环境吗？

因此，我以为，关注广东，关注广东的现代性的文化因子，不管好的因子，还是坏的因子，在今天，都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广东的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基础的，高端的精神文化，观念文化，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间里，从制定战略和政策的宏观的把握方面来看，确实被重视和开发得十分不够，存在着严重缺失，但广东的现实，这里所呈现的生活方式，这里的不少不被人发

见或重视的思想和创作，所有这些里面所包含着的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之前沿的因素，却绝不是可以小觑的！)

而作为广东的批评家，关注身边，关注广东，实在也就是关注中国，关注世界。

事实上，远辉的这个文集，它的出发之点，确乎就是脚踏实地的身边，然而其视野，却是从身边，向广东，向中国和世界，尽其可能地扩大着。(即使从集中的篇目看，虽是身边的居多，然关于当下中国整体的文学文化大势的讨论，也是显著的站在那里的。)

从身边，到世界，这则是文格上的一种张力。

2007年5月19日于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村

目 录

- [1] ·序：身边的·广东的·中国的 金 岱
- [1] ·谁来赴文学丰盛的晚宴
- [3] ·第三种批评：适应当下发展的新批评
- [5] ·合为时而著
- [7] ·知识分子立场：文明转型的文化应答
- [10] ·批评的新风景
- [16] ·桃李园中自有蹊
- [18] ·苍天厚土蕴大爱
- [22] ·艺术性地呈现当代生活特质
- [36] ·南方思想者的言说
- [49] ·不是与己无关的另类的生存文化
- [53] ·乖张的当代官场“现形”记
- [57] ·对一个现代话题的朴实叙说
- [60] ·一阙侨乡爱情故事的苦歌
- [67] ·一部像大山一样耐看的电视剧

[70] ·情到深处人孤独

[75] ·好人是时代的良心

[77] ·品读蒋乐仪的散文

[81] ·《广东九章》：认识广东的直通车

[84] ·客家人：汉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薪火的相传者

[88] ·好人文里有甘泉

[94] ·在时光足迹里感受土地和亲情

[97] ·处世宜清心 为文需心清

[102] ·真诚编织文学的花环

[106] ·让生命去承担

[112] ·把握着城市发展脉搏的深度报道

[118] ·写画不尽的明月心

[121] ·写作主体机制：现代写作学研究的新视域

[128] ·研究文章构成的崭新思路

[132] ·论新闻写作中的散文笔调

[142] ·戏剧性情节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

[157] ·当代文学还能逃到哪里去

[170] ·可能的误区：“人文”与“后学”

[180] ·后 记

谁来赴文学丰盛的晚宴

可以想象世纪末的中国文学正举行盛大的晚宴：主人是隐身的“市场”；流水般送上来的菜五花八门：艳情、仇杀、乱伦、武侠、财经、秘术、黑幕、大气功师、风水相卜、名人趣录、宫闱秘事，或者古典小碟或者现代大拼盘，又或者市井风味或者贵族色调；场面也极尽浮嚣狂欢：人如潮来潮往，声若市肆叫卖，村俚京语、打情骂俏、喁喁私语、谩骂攻讦、自渎造爱，真是人声鼎沸，蔚为奇观。世纪末的情绪和图景毕陈无遗，而且，这样的狂欢未知要持续多久。

现在，要弄清楚的问题是，谁来赴晚宴？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赴晚宴？

不必否认，动荡的世纪末污辱了命乖运舛的文学，文学的身价一落千丈。文学在昔日是圣殿，意味着聆听和传布，还让诸如苏比之徒接受风琴的赞赏诗一样洗去心灵的尘垢。但现在几乎变成了市场，大门早已倾塌，谁都可以进进出出，谁都可以以金钱名分或者市场需要的名义，在文学的贝叶上镌上自己的名字。因此，世纪末文学的盛宴，必然成为大众狂欢的场所。

让人欣喜同时让人沮丧的地方正在于此：谁都可以赴文学的晚宴，而且，无论是贩夫走卒、市井无赖，还是酸儒寒士、显宦后裔，都以原始的面目赴宴，堂而皇之。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用品，文学走出了封闭，这无疑是大好事。而文学成为大众狂欢场所，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学已丧失主题，于是，大众狂欢者终将醉倒在自酿的酒浆里，完成对文学的洗礼或曰污辱。而我们大量已有

桂冠、封号的作家们身影何在呢？这个时代可以作证：有的作家远远逃离狂欢场所，有的作家如鱼得水介入狂欢，有的作家失魂落魄，被狂欢的声浪淹没，还有的作家把自己作为一道菜肴，摆上桌面，显示先锋作派。文学成为现实享乐的人伙者，这怎么不让人沮丧呢？

宴无好宴，酒无欢酒。狂欢终将过去，大众终将离开，而最可怕的或者正在于此了：只剩下我们的作家们烂醉在一片狼藉里。

谁是罪魁祸首？经济时代？世纪末情结？普罗大众？这样动荡的时代，作家敏感的心怎么能不动荡起来呢？但是，动荡的时代更需要毫不动摇的意志来看护脆弱动荡的心灵。坚定的意志只能来自纯粹的精神。文学纯粹的精神，绝非对传统的抱残守缺，绝非对价值标准的一以贯之；它只能是新锐的人文精神，它汲取时尚又高于时尚，它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世俗，它延续文学的本质内涵，又指明文学的努力方向和企图达到的高度，回答文学关于人生和世界的根本命题。在动荡的时代，对文学而言，还有什么比作家、批评家自身的清醒和绝不媚俗的精神更值得守护呢？还有什么比提倡新的人文精神更为迫切呢？

谁来赴文学丰盛的晚宴？这个命题，并不仅仅属于文学。

1995.5

第三种批评：适应当下发展的新批评

依照传统对基数“三”的习惯性理解，可以将“第三种”看作是一种泛称，即尽人皆知，名头响亮，正派名门的第一、第二种以外的，新冒头的，在“野”的新类。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一打。我觑见已有某些理论批评家们津津乐道于对第三种批评作如上阐释，他们以为成功地对文化进行了分解，并为批评格局的解构化弹冠相庆了。只是他们忽视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第三种批评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广东的青年理论批评家们提出“第三种批评”，是针对北京、上海热闹非凡地喧嚷“后现代主义批评”、“人文精神批评”而来的，也就是要在这两种批评之外，进行一种新的批评。很显然，第三种批评不是要在第一、第二种批评之间充当和事佬，两面光，左右讨好，和稀泥，中庸，它是不能被其他类项的批评包容、代替的新类批评，需要重新确立和规范批评的目的、对象、准则以及具体操作手段。

不能仅以地域的眼光去衡量第三种批评，以为它不过是要分庭抗礼，在北京、上海的批评热点之外另立“中央”，搞“第三俱乐部”。文化批评（包括文学批评）产生的对象和要解决的对象都是人类的生存处境，人类的精神、思想状态，真正的理论批评家们思想的来源不是建立在本本主义、玄想的空中楼阁上，而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脉络清晰的把握，对现实生活准确而透彻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科学预见上的。机窍正在于此：提倡第三种批评的有识之士正是清醒地意识到了别的批评在理解现实和预见未来方面的不完善之处，看到了它们在对现实生活的功能作用上的局限。这是一个绝不

能被漠视的关键性问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或曰我们的生存处境如何？文化处境如何？

我认为文化人不仅要思索这个时代给文化带来了什么，更要思索文化能给这样的时代发展格局带来什么，怎样才能于人有益、于世有补。我们的民族、时代正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新转折关头，我们正处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正迈向市场文明。这种发展是我们最需要的，它来之不易，需要全体人民去维护、巩固、推动和发展。转型时期的巨大变化，必然要严重冲击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必然会有泥沙俱下的情况，何况这个古老的大国总是积重难返。如果只看到不利的一面，便会贼忒兮兮地去解构呀、游戏呀、智慧呀一通；如果只看到机械化、市场化，看到物欲横流，给传统道德、价值文化尊严带来的损害，便会忧患不平，要维护，要捍卫，要坚持……以上的见识自然是合理的，也是需要的。但是，仅有这些，文化（文学）批评就功德圆满了吗？除此之外，文化（文学）批评就不能对我们迫切需要的这种社会发展在文化（文学）上给予相应的肯定吗？当然，我们的文化（文学）批评不应自贬身份为侍从者去阿谀逢迎，一味歌功颂德，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天下大治。我们的文化（文学）批评必须明白自身的职责所在，明确自己的评判尺度，清楚应当褒贬、扬弃什么。我想，这正是第三种批评的出发点，其实并没有什么玄奥、幽秘而不足以外人道处。

因此，我所理解的第三种批评是这样一种批评：它是适应当下市场文明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以人本为中心，关注当下文化，精神建构的新的文化（文学）批评，它契合时代的需要，对时代进行科学的扬弃，并力图对社会转型的更加进步的推动产生助力。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可以对第三种批评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阐释，可以把它当作姿态、先锋、诗意的过程，甚至是此岸情怀、新理想主义……这些都将使第三种批评更加丰富化。但是，不论怎样阐释，第三种批评的出发点和中心都不应偏离。

1997. 3

合为时而著

不久前，作家蒋子龙在北京召开的陈国凯长篇小说《大风起兮》研讨会上，说到这么一件事：一位经济学家曾对他说，当代文学在题材上有两大空白，一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几户村民摁下血手印自担风险承包土地，由此引发了农村的体制改革；二是蛇口工业区及深圳特区的建立，拉开了中国经济开放的大幕。经济学家感到迷惑的是，像这样必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大事件，为什么却被作家们忽略了！

无独有偶，女作家毕淑敏在一篇文章里也写到：一位经济学家和她聊天时说，整个社会就好像是一列火车，当列车行进的时候，文学家在哪里？做什么呢？女作家优雅地回答，他们在看风景，看车窗外的风景和车窗内的百态。他们欣赏音乐；去餐车看看或吃盒饭；会脾气不太好，为饭菜质次价高或不新鲜不卫生而大声叫屈；车子开得太快、车身剧烈颠簸时，会为妇孺的呻吟和自身不舒服而呼唤和抗议；会痴痴地看窗外亘古不变的风景；会在夜晚众人酣睡时独自不眠；会听到啼哭时，披衣起身来到老嫗或孤儿身边，倾听他们的故事，流下眼泪；当然，也会为自家的屋子孩子职称等事操心……经济学家终于弄明白了作家们在“火车”上的行迹，但他仍倔强地请问：文学家们想过要站到火车头上去，看司机怎样执掌方向，看司炉怎样添煤烧水，听呼啸的风声，看弥漫的大雾吗？

颇有趣的“巧合”——都是经济学家对我们作家提出疑问和要求。似乎经济学家们都不太满意我们作家的作品，尽管“车厢”里的作家津津有味操练的内容多么富于人性和人情味。经济学家从他

们自身的角度看出了当代文学的缺陷以及当代作家和他们心中所期望着的差异。打个比方，同样在行进的火车上，经济学家考虑的是火车的速度、安全，也即社会发展的效率和公平。作为文学的读者，经济学家便是那类永远跟着时代火车头跑的读者，那种不由自主总是朝着前进方向打量的读者。因此，他们更看重更期望的是作家们能够关注时代前进的方向和与之相连的工作，作家们能够及时地反映出当代社会的进步和那些深远地影响着当代生活的内容。

其实，经济学家关心的仍是个老话题，即文学如何反映时代。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老话题，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但似乎不提久矣！在这方面，文学有过教训。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是依附于政治的，跟着时代的号令跑，成为时代简单的宣传品。拨乱反正后，文学的创作规律获得了重新认识和尊重，文学由此获得了自由的天空。然而，渐渐地却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私人化写作大行其道，而关注时代命运，反映社会变革、社会进步希望的创作却严重滞后，似乎作家们缺场了，似乎作家们丧失了感受时代前进脉搏的能力和激情！

我以为，文学园地可宝贵的当是百花齐放。既如此，则品种是愈多愈好。有人写清宫秘闻飞仙狐怪，写家庭琐事市井百态，也当有人写社会变革时代大潮，写当代英雄弄潮健儿；有人蛾眉秀口浅吟小夜曲，也当有人铁板铜琶高唱大风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作家们都离开自己“车厢”的位置拥到“火车头”上去。倘若都一呼隆拥了过去，走向又一个极端，恐怕也危险。只不过，当大家都在看车窗外风景和车窗内百态时，难道不应当有那么一些作家能够从人群中站出来，沉稳坚定地走向火车头……

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说过：“对诗人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他能体现自己时代历尽创伤的良心。”又岂止是诗人应当如此呵！

2001年10月

知识分子立场：文明转型的文化应答

——读金岱思想随笔集《“右手”与“左手”》

爱因斯坦认为：“你能否观察眼前的现象，取决于你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理论决定着你到底能够观察到什么。”社会转型时期的今日的中国，社会分工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思想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文明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它也必然要影响整个社会文化形态发生变化，在传统伦理文化形态的领地上催生经济文化的萌芽。本世纪末中国社会嬗变的一切，再一次深刻影响知识分子的命运，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话语权力，精神规则都是巨大的冲击。如何看待市场文明？如何确立知识分子的当下姿态？知识分子何以安身立命？这一切，需要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明的前提下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我们看到这些年，文化界尤其是文学界对此热热闹闹地争鸣乃至争吵从未休止过。正因为理论是永远先于观察的，不同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原则，不同的文化立场，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模式和结果。站在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用历史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无疑对思想的深刻而言是最具力量的。金岱正是置身于这样的坐标点上进行思考，他富于启迪性的思想见解源于他对文化思维模式的解剖和对传统的、现代的知识分子命运的分析，他对思想精神发展的要求基于对心灵自由和个性独立的肯定，他在勾勒出我们已有的文化铸型和思想樊篱的同时，鲜明地指出文化思想在今天以及将来必然出现的尴尬境况和应当的姿态。他指出传统文化的痼疾，他也痛陈经济文化的流弊。他的思想不是即

兴闪现，而是核心彰显脉络分明，他的近百篇思想随笔是对其思想核心的不断锻打和淬火。在他激情化的表达下埋伏着冷峻的态度，他因此发出独立的声音。

无疑，金岱的视角是市场文明，他是将肯定经济文化作为思考的前提。在金岱看来，市场文明取代传统的血缘文明与泛血缘文明，经济文化取代传统的伦理文化，是历史的进步。市场文明自然会将文化导向通俗、媚俗、平庸、表浅、批量生产和 COPE 化，形成文化流弊。然而它有利的一面是借助物质主义的洪水浊流冲垮了顽固的传统文明之根，它带来了第四次产业革命——文化产业革命，引发了今日文化的阵痛：文化人的精神失落感，心理浮躁和情绪愤懑，乃至自陷于侏儒境地；精神的批判与建设；文化的消解与营建；等等。阵痛又带来全方位的深刻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面对市场文明的知识分子需要重建精神规则，即建立超越于传统文明的适应市场文明的崭新的人文精神。金岱指出，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观念的转变，“人是观念的俘虏，社会转型首先是观念的转型，观念变了，一切好变，观念不变，一切难变”。（《文化人心结》）。毕竟，转型时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譬如文学，正可以借此将传统型的以趋权为最大特征的社会本位文学，转变为以表现和揭示个体人的生存境况的个人本位文学。社会文学当然具有批判社会的长处，而人本文学又有易滑向媚俗的短处，但是，人本文学更能表达人类发展的精神需求，它是从个人生存的角度切入我们的全体存在，是以研究个人生存方式为目的的文学，它有利于将人们从依赖于社会的传统心理中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完善自身。显然，这样的文学景观是彻底全新、真正诱人的。金岱将他的主张和努力命名为“意义的先锋”，他独立的见解切中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要害。

可以看出，金岱提出的思想观念具有“于世可补”的特征，不要以为他对市场文明的肯定是廉价地欢呼“新生事物”，这种肤浅片面的行为是无法使自己的思想见解充满雄辩和震撼力的。金岱是清醒地看待并清醒地表述这类易于模棱两可的问题的，他漂亮地采用形象性的说法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总之我们现在该干的是，举起我们的右手，反对传统文明形态，再举起我们的左手，抵抗物